

台灣省教育會叢書之壹

當代教育家

(第一輯)

台灣省教育會編印

台灣省教育會叢書之一

當代教育家 第一輯

發行：許國雄

策劃：劉焜輝 楊宗德 王懿菲

撰稿：林振春 洪美慧 艾弘毅 周宗仁

編輯：柯水源 駱神松 葛寶勤 張星襄

鄭慶宗 盧學鈞 洪武夫 周宗仁

出版：台灣省教育會

台北市青島東路五十一號二樓

電話：(〇二)三五一九六七

郵撥帳號：四四九三號

印刷：明光堂印書局

基隆市義五路七號

初版：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元月十五日

定價：精裝每册新台幣一五〇元

平裝每册新台幣一〇〇元

目錄 (以姓氏筆畫爲序)

許序	一
劉序	二
淳樸仁厚的方永蒸先生	三
實事求是的王家驥先生	一三
北一女的大家長——江學珠女士	二六
擇善固執的辛志平先生	三七
古道熱腸的林本先生	四七
輔導學權威——宗亮東先生	五九
追求真善美的高梓女士	七〇
方正嚴謹的孫元曾先生	八三
誨人不倦的孫邦正先生	九三
苦幹實幹的張農先生	一〇六
致力國語教育的張希文女士	一二一
向時代挑戰的張建邦先生	一三二
誠正勤樸的郭爲藩先生	一四三
思想教育泰斗——傅啓學先生	一五三

著作等身的雷國鼎先生·····	一六五
求真求實的賈馥茗女士·····	一七七
英語教學的先驅——趙麗蓮女士·····	一八六
高瞻遠矚的劉真先生·····	一九六
退而不休的教育精兵——鄭來進先生·····	二一二
學貫中西的鄭通和先生·····	二二二
忠勤方正的蘇薊雨先生·····	二三四
道德教育的篤行者——龔寶善先生·····	二四四

序

教育的成敗決定國家的盛衰與民生的榮枯。三十多年來，台澎金馬自由地區各項建設之輝煌成果，世所共睹，其間除大有爲政府的英明領導之外，教育工作人員的辛勤努力，爲國育才，功不可沒。然而近年來由於經濟快速成長，社會結構及價值觀念亦隨之轉變，功利主義高漲，精神文明衰微，道德淪喪，世風日下，教師地位相對低落。

正當本會積極圖謀發揮教師專業精神，以提升教師地位之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學生輔導中心劉主任焜輝，建議本會發行之「台灣教育月刊」，每期增闢「當代教育家專訪」一欄，介紹當代傑出之教育家，以爲教師楷模，並增進社會人士對教師之認識。本會爲透過對當代教育家之介紹，使全省教育工作者奉爲榜樣，砥礪教育志節，秉持「薪火相傳」的師道傳統，繼續發揚光大，乃欣然接受。

「當代教育家專訪」自民國七十年三月在「台灣教育月刊」登載以來，已陸續刊出二十二篇，每篇都能獲得讀者的喜愛，詳加研讀。且有衆多讀者，紛紛來信向本會建議，將已刊出專訪各篇，集印成冊，以便保存參考。本會爲擴大影響，立即成立編輯小組，將刊出各篇文稿，收集整理，重新校訂，編排付印。書成之際，爰誌數語，敘述編印本書之旨趣，並感謝接受訪問的諸位教育先進，以及參與本書策劃、撰稿、編輯、校閱之諸位小姐、先生。

許國雄 謹識 73.1.15

於台灣省教育會

序

「歷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有相當多數都做過老師；文明上最偉大的進步，絕大部分並非政治家、發明家、藝術家所帶來，乃是教師努力的成果。」這是海黑（Gilbert Highet）在其名著「教學藝術」中所敘述的話，相信可以得到大家的共鳴。教育是國家的百年大計，國家興衰端視教育是否上軌道，而教師良窳乃決定教育事業的成敗。我國古今聖賢強調人師比經師重要，歐西學者反對教育祇偏重教學技術而有人格教育學之指導，並強調「兒童世紀」之後應該是「教育家人格」的世紀，中西不謀而合。

我國近年來各項建設進步迅速，令國際人士刮目相看，究其原因，教育普及，人力素質提高是最大的原動力。教育界人士從不同的崗位上獻出自己的智慧與熱忱，彌足珍貴。台灣省教育會與師範大學學生輔導中心，為使從事教育工作者，能夠擷取教育先進之豐富經驗及學養，發揮見賢思齊之功能，乃策畫舉辦「當代教育家專訪」。

「當代教育家專訪」對於訪問對象之選擇，非常慎重，其中有著名教育家或辦學著有績效者，亦有教育行政首長政績卓越者。訪問內容包括①生平暨求學經過，②辦學、教學及從事教育行政工作之經驗，③對我國當前教育之觀感，④對我國今後教育發展之建議等，每次採訪時間雖然僅為短暫的一、二小時，但從策畫到實際訪問，整理稿件，送請被訪問者校閱、定稿，整個過程有逾月者，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訪問稿送交「台灣教育月刊」按月發表，訪問錄音帶則由師大學生輔導中心編目存放於資料室，隨時供校內外人士利用。專訪工作推展之後，教育界人士有強烈的回饋。此項工作獲得大家的肯定，令人欣慰，但是已經列為訪問對象的教育先進中，偶而也有因健康或其他原因未能實現訪問計畫，則是莫大的憾事。

台灣省教育會先將「當代教育家專訪」二十二篇，彙集成冊。不但提供教育界人士之典範，亦且為現代教育史上最珍貴的史料。重讀一過，除對諸位教育先進表示最大的敬佩之外，謹將策畫及工作進行的經過介紹如上，並盼教育界先進共同支持，使此項富有意義的工作能繼續推展下去。

淳樸仁厚的方永蒸先生



方永蒸蔚東先生，遼寧鐵嶺縣人。生在樸實淳厚的農村，長在日俄交相侵略的時期。因而孕育了他忠誠謙遜的性格和高度的愛國家愛民族的思想。他讀過私塾，對於經典，曾有涉獵。中學畢業以後，入北京高師（後來改稱為國立北平師範大學）英語部，後又續讀該校教育研究科，民國十一年畢業。他深信只有用教育方法，啟迪民智，陶鑄人才，才是救國的根本大計，所以在他以後七十餘年的生涯中，都直接間接獻身教育界，辦中學、辦大學，有時候主持行政，有時候執鞭教書，桃李滿天下。來台之後，曾出任兩屆考試委員，任滿後，專任國民大會代表。其間對於促進教育事業的發展，一直是不遺餘力、老而彌篤的。

濃厚的教育研究興趣

民國六年，他畢業於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英語部，受聘為奉天省立甲種農林學校英語教員。過兩年，學校停辦，轉任奉天省立第三師範學校教員兼學監。那時，該校管理甚嚴，早晚兩次宿舍點名，一日三餐飯廳巡視，課外活動也得出場監督，防止學生逃席。星期例假，更須巡視街上各飯館，以防止學生浪費金錢。這一切都是學監的例行工作。經過半年，他深覺身似獄卒，此種只重消極管理，不肯積極化導的方法，殊違教育原理。因而辭職，赴北

平考入北師大教育研究科第一班，從事教育研究工作了。

當時教育研究科，名家咸集。李建勛、劉廷芳、張耀翔諸先生，才從美國回來；杜威博士夫婦曾來校講學；孟祿博士也曾來華指導調查教育。於是新理論、新方法、激蕩而成活潑的研究風氣，他深受教益，研究的興趣也因而提高。爲了學以致用，乃兼附中一年級的學級主任，並教英文，那時候的教學方法，仍多採注入式，習故蹈常，很少改進。他採用新的教學法，先指導學生預習，上課時再令學生試讀試講，漸漸地學生感到學習興趣，進步很快。等到第二學期，學校舉行英文閱讀能力測驗，一二年級用同一教材測驗，結果他所授一年級成績，竟有超出二年級之上者，於是深得學校器重。

他對於訓育的方法，也有獨到的見解，主張積極的指導，培養學生優良的生活習慣及自治守法的精神。在兼任附中一年級學級主任時，即本這一貫主張，培養學生的活潑朝氣，力避消極的控制與壓抑。起初，教室內無課時，學生們有的如脫韁野馬，吵鬧喧囂，秩序相當紊亂。他乃乘級會之便，令學生自我檢討，把逾越規範的行爲自動的說出，由他一一寫在黑板上；然後討論如何糾正改進。結果共同議訂自治公約若干條，寫好掛在教室牆上，並推舉幾位糾察人員，發現不守公約的人，就加以勸導，如果不聽勸導的，就報告學級主任處理。從此以後，喧鬧紛亂的情形，大爲減少，自治精神，逐漸養成。此後先生不論辦中學、辦大學，對學生訓導都一本這種原則，也都收到了確實的效果。

民國十一年，他師大畢業。時附中擬改革教學及訓導方法，乃公推他和當時的教務主任王仲超先生，赴江浙一帶參觀教育。經南京、無錫、蘇州而至上海。當時正值「直皖戰爭」一觸即發，形勢險惡。王君因懸念學校和家屬，倉皇北歸。他則因研究興濃，不顧一切，繼續參觀嘉興、杭州、南通等地。那時，舒新城先生正在上海中國公學中學部實驗學科制，杭州師範也作同樣實驗，他特別感到興趣。因爲他的畢業論文正是：中學學科制。其主要論點在注重個別差異，因材施教。真是南北同道，不謀而合。他乃詳詢其困難之點和改進的方法，進而探討它的利弊得失，終於發現此種制度在實施時，仍有許多不能克服的困難。第二年，道爾頓制傳入我國，舒氏首先採用而放棄學

科制，各校亦紛紛仿效。

這年秋天，他任奉天省教育廳「視學」。那時中學是四年制，課程艱深，高小畢業生學習發生困難，難於適應，他乃商請當時的謝廳長在瀋陽大東關，創辦實驗中學一所，招收高小畢業生，兩年畢業，專授各科基本知識，以謀中學和小學的密切銜接。開學不到半年，就奉教育部令，中學改爲三三制，該校接著變成初級中學。因學校規模已具，且爲全省第一所初中。所以各縣都來該校參觀，用作建校的參考。他在這期間，又擬試驗「道爾頓制」，乃搜集相關材料，供全體教員研究，每週開會一次互相討論。後來雖因多數教員採取審慎態度，未能實行，但是他富於研究進取的精神，也可見一斑了。

民國二十五年秋，他專任國立北平師範大學教授，對於教學也採用新的方法。後來在他的七十自述中曾這樣說：「我因剛從美國歸來，深贊美國大學的教學方法，於是我在師大教學，便決心改革，在我所授教學法中，注重學生自動研究精神，所編講義，率以大綱及問題爲主，附列參考書目，令學生按大綱及問題自行準備，上課時再互相討論，最後由我補充並作結論。可惜學生平素缺乏這種訓練；又因我國大學課程科目繁多，學生沒有充份時間作準備工作；同時圖書館中，各種重要參考書籍的數量，不敷全班學生閱讀之需，以致未能收到預期的效果。」可見他在大學的教學法，也當有大刀闊斧的改革精神。

強烈的國家民族意識

他幼時，親眼看見拳匪之亂和日俄戰爭，兇殘的帝俄和日本軍閥，到處淫姦擄掠，而日俄戰爭不在各該國的領土內作戰，反而蹂躪我們的東北。國家貧弱，任人宰割，這種奇恥大辱，激發了他強烈的國家觀念與民族意識。九一八事變時，他正留學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作研究生。驟聞事變噩耗，悲憤填膺，馬上邀集同鄉友人聚議，當時議決先向中央政府拍發電報，請求政府一方面向國聯控訴，一方面積極準備抵抗，並聲明留美學生誓作後盾。由他撰稿，親赴電報局拍發。因情緒極度緊張，竟把一支心愛的名筆 *Pen* 遺失，足見所受刺激之深了。

他在七十自述中這樣寫著「……在東北初陷，當局未作絲毫抵抗時，我們旅居異國的學生，深引爲奇恥大辱，自覺無顏見人。但是不久，東北各地義勇軍風起雲湧，紛紛抗日，美國報紙也競以顯著地位、大字標題，用興奮同情的文字連續報導馬占山，李杜諸將軍領導抗日的消息。美國友人再遇到我們，也翹起大拇指，深致敬佩之意了。這時大家才覺得稍可抬頭。爲了略盡自己的責任，乃與我留美同學組織義勇軍支援會，每兩人一組，分頭向華僑商店宣傳日本侵略東北情形，勸募捐款。因同學行動積極，華僑愛國心強，募款成績頗爲可觀。」

民國二十二年春，他由美國歸，在船上也有一段有趣的故事。他說：「我因旅費不足，坐三等艙，艙內絕大多數是歸國華僑，甚少外國人。我便向大家宣傳日本侵我東北，以及我國民間武力抗日情形，大家知道我是東北人，也紛紛問我東北各種情形。船過日本時，大家激於義憤，相約不下船，不買日本貨。不料至夜十一時許，忽有人抱滿一懷日本貨回到船上。大家一見，怒氣沖天，立刻把他圍毆一頓。那人十分愕然，便用英語問我們爲什麼打他，大家說明以後，他才說出他是安南人（也許是緬甸，我記不清了），於是大家知道打錯了人，連忙道歉。」

他這種熱愛國家民族的思想，反應到教育方面，便是極力提倡民族精神教育。他認爲：「一個民族生存於世，一定有她生存的依據；或是靠宗教信仰來團結意志，或是靠文化傳播來教化人心，因而構成民族意識，締造民族形態，卓立於天地之間。我中華民族綿延數千年來，生存的憑藉，就是堅韌的民族精神。」

所以他主張：「民族精神的培養，乃全體教育文化工作人員之責任，甚至政府之種種措施，也直接間接發生影響。例如學校教師儘管教忠教孝，培養正氣，而報章、刊物、電影、戲劇則晦淫晦盜，誘導邪惡，其教育效果，往往因而抵消。故報紙書刊應儘量登載民族英雄，忠貞節烈，可歌可泣的故事，並編爲電影、劇本及連環圖畫，以助長學校教育之效果，而普遍化育廣大民衆。」

這種學校與社會打成一片的民族精神教育的實施辦法，眞是最具體最徹底不過的了。他曾指出：「有些中等學校的公民，側重知識灌輸，忽略身體力行，遂有捨本逐末之弊。公民科原本包括多種知識，而公民科教師並未經過公民科專業訓練，多由文科教員分任，難免使人發生錯覺，致令教師學生對它都不重視。中國倫理道德，政治思想

，民族觀念以及三民主義，在中等學校中端賴公民課程來開發的，而公民課程却被忽略，還談什麼民族精神教育？

他在民國四十二年「中國教育學會等聯合年刊」中發表：「從過去教育之失敗談教育改革」一文，結論中這樣寫著：「由清末興學到民國成立，教育失敗之主要原因，在於宗旨屢變，動搖不定，若有若無，缺乏中心思想，未能培育民族精神。國民政府成立以後，教育宗旨非不明確，法令規章非不完備，教育失敗主要原因，在於法令規章未能徹底實施。」

因此，他曾撰文大聲疾呼，提出積極性的建議：

「我們現在正積極準備反攻，應加強民族精神教育，樹立三民主義教育思想。收復大陸後，還要從速肅清共產主義毒素，所以必須有足以擔任三民主義，公民課程及訓育工作之優良教師。師範院校，應恢復抗戰時期曾經一度創設，旋即停辦之公民訓育系科，以加強研究三民主義、中國倫理道德、及擔任公民課程所應瞭解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學科；並注重研究青年心理，訓育理論及方法。此種人才之培養，實關重要，刻不容緩。」此文發表於民國四十二年，今天台灣師範大學早已增設公民訓育系，且台大、中國文化大學都設有三民主義研究所，他當年之主張見諸實行，甚感欣慰。

認真負責的服務精神

他辦教育，極為認真負責，凡是跟他共事或從學日久的人，大都能言之鑿鑿。民國十四年，他任奉天省立第三中學校長，校址在瀋陽東郊十里外的東塔，校舍因遭兵工廠爆炸的波及，毀損甚重，乃另擇北陵前御花園建築新校舍，雖有事務人員監工，但他仍不放心，每日奔波於東塔與北陵道上，從不稍懈。後一年，他任哈爾濱特區第一中學校長，興建校舍，安裝暖氣，包商例送回扣，他拒收。包商係西洋人，為此對他倍加崇敬。二十二年，自美歸國，任東北大學（當時已遷北平）教育學院院長，第二年又兼文學院院長，另兼東大分校主任。他每日僕僕風塵於北

平的西、北、南各城。而各處事情都處理井井有條，毫無倦怠厭煩的表示。

抗戰時期，他任國立西北師範學院教授，兼附屬中學校長。校址設陝西城固，因物資缺乏，設備大多因陋就簡。附中每一教師只發一桌一凳，而他因係師院教授，得享受教授待遇，改凳爲椅；但他却退還座椅而改坐木凳，用示與附中同仁共甘苦。他聘請教師，更爲審慎。凡是西北師院畢業的，不但要學問超出同儕，而且操行更須優異，在聘請之先，必查在校成績，並訪導師，毫不含糊，才能下聘書。如果是師院以外的，也必須拐彎抹角的探得清清楚楚，毫無問題，才能相約。招考新生錄取標準極高，學生升留級完全以成績爲準，絕無情託伴進的情事。校長及各位老師的子女，亦無例外。他十口之家，常以白薯摻飯，生活清苦。供應附中麵粉的老闆，曾在過五月節的時候，很誠懇的送給他一袋麵粉，盛情難却，只好暫時收下，但鄭重聲明，稍後必自付麵錢。不久，當他家離開城固時，如數付給商人麵錢。這種清廉自持的高風，真可抗衡古人而勵來茲了。

抗戰勝利後，他奉命接收東北教育。卅五年八月，在國防最前線的吉林市郊，創辦國立長白師範學院，羣路藍縷，備極辛勞。不幸在規模粗具，弦歌乍起的時候，遭受共匪的瘋狂攻勢，長白師院也就隨著戰局的逆轉，奔向閭關萬里的流亡旅程。而撫順、而北平，而湖南衡嶽，而廣東瓊崖，到處爲家，到處上課，也到處作反共抗俄的宣傳，從沒有間斷。在大陸上數百所大專學府中，像長白師院這樣，千里迢迢，始終追隨政府，始終不忘讀書，更始終做反共抗俄宣傳的，恐怕是絕無僅有了。當吉林還沒撤退以前，他已在撫順把臨時校舍安排停當，等到吉林師生到齊，即時上課。遼西會戰失利，東北垂危，他早已在北平布置就緒，師生分批抵平，馬上又繼續弦歌。天津失陷之前，政府決心搶救北方大專院校師生，派員勸導，派機迎接，長白師生不用勸，不用接，早已遵照政府賢明決策，由他在湖南擇定地址，命師生有計畫的南下。其第一批在天津失陷前就安抵上海，轉浙贛，下三湘，順利地寄讀南嶽國立師範學院了。大江天險，擋不住滔滔赤流，長白師生應集到羊城，東渡？西遷？南下？坐守？一時幾乎沒了主意。幸而瓊海中學借給他們場所，暫做安身立命講學論道的搖籃。後來，赤流吞沒了神州，長白師生，嘗盡人間辛酸，才飄泊到海的這岸。而他噙着淚水，理長白師院停辦善後的事宜。

當卅八年春，長白師生在衡陽的時候，他在上海領到一筆一百人份的救濟金，原爲每人金元券兩萬元，可是到了衡陽，每人却增爲三萬元，師生皆大歡喜。因爲那時幣值，一日數貶，他爲了保值，於領款後，馬上兌換黃金（當時黃金自由買賣），不料幾天之間，竟獲百萬暴利。他如飽私囊，是神不知鬼不覺的，但他絲毫不苟，而使學生全體分享。他初到台灣，爲節省公帑，住在延平北路一家旅館裏最小的房間，寫字都得以牀代桌。有一天，被他在西北師院教過的學生，也是那時台北女師（現改台北市立師專）附小校長白子祥先生知道了，特地把自己住的單身宿舍借給老師，他才算有了辦公桌子。在高不過八尺，寬不過八席的房間中，他又容納了一位教授，一位職員和一位學生共擠一起。吃飯豈止不見肉，簡直連素燒豆腐都成了珍品。有一次，寄住的那位學生特爲他炒一盤蕃茄加蛋，他見了久久不能下箸。說：「我們師生有的困在馬公，不能入境；更有的困在海南島的三亞，打柴度日，你做這樣好菜，我怎能下嚥呢？」這一番至性流露的話，感動得那位學生不禁熱淚盈眶！

師生同甘共苦的事蹟

他平生待人處事惻隱慈祥，謙退有禮。無論對同事或同學，無不愛護有加，隱惡揚善，尊重對方人格，而做到真正的民主。所以他所主持的學校，都是師生和樂，親如家人，當他在瀋陽第一初中時，本欲實行道爾頓制，但贊成者只有二人，只好作罷，毫不勉強。在西北師院附中時，每當開會討論問題，同仁總是爭著發言，熱烈討論，有時雙方唇槍舌劍，辯得面紅耳赤，可是既得結論，都一致遵從。可見他的領導，十分成功。

附中學生大多來自戰區，經濟來源斷絕。政府爲了救濟青年，特設貸金制度，但是撥款遲緩，而物價則直線上升，因此附中時常陷在窮困之中。他每日爲了學生吃飯問題東奔西跑，各處告貸，而學生伙食已經降低到只能果腹的地步，談不到營養了。「不當家不知柴米貴」，有些學生不瞭解校長的苦心的，偶有煩言，他並不責怪，只是讓學生到他家裏看看。等到學生明白他吃的比學生更壞時，不但不再發牢騷，反而對他起了由衷的敬佩。附中老校友曲克恭先生的「滾滾漢江憶附中」一文中，有這樣一段：

「我們同學中有的家在淪陷區，有的家在數千里外，學校用教育部給我們的貸金，千辛萬苦的在那艱苦的日子裏讓我們無憂無慮的念書，誰會想到在那一盆大鍋菜和一桶糙米飯的後面，耐東校長是怎樣的爲我們操勞呢？記得是民國三十一年的一天，在早會上，校長站在我們一排教室前「土操場」的磚砌講台，用他那低沈的東北口音說，貸金沒有到，向縣政府和祝紹周司令（漢中警備司令）那裏都借不到米，在城裏有家的同學先回家，其他的同學，學校每天用餘米煮三餐稀飯維持，說到這裏，校長哭了，眼淚從他的眼鏡後面流過面頰。今天，在台灣我們班上的幾個同學們偶然相聚在一起，每每談論附中的往事，提到了校長宣佈吃稀飯流淚的情景，仍然會使歡聚的氣氛沈靜下來，心中感到一股傷感。」

當年附中的師生，全部住校，導師宿舍介於教室與學生寢室之間，學生全部生活，從課程、個性、身體以及思想、行爲、交遊等等，導師無不了然於胸。學校把學生獎懲大權交給導師，導師也都能認真負責起責任：督促用功，指導生活，甚至有的夜間巡視宿舍，爲學生蓋被子，有的憑自己的經驗，爲學生包傷治病。導師成了全班的家長，而校長則成了全校的族長，天倫團聚，化爲一個整體，分不開也解不開了。附中就這樣蓬蓬勃勃的滋長起來，只經過短暫的三年時間（二十七年到三十年），她就脫穎而出，名滿天下，爲全國升學率最高的一所中學，而蒙教部頒贈「啓迪有方」的匾額。

他所手創的國立長白師範學院，在亂時誕生，在亂時成長，也在亂時止歇。在這一生一長一歇的過程中，更看出他的民主風度，也更發現他的慈藹光輝。學生社團在長白師院是最活躍的，出版壁報，發行刊物，如雨後春筍，只要態度公正，用意善良，縱使言論有些偏差，學校也是站在愛護與輔導的立場溫言加以糾正。有時涉及到實際生活問題，同學們偶用火藥味極濃的文字對訓導處工作人員予以無情的攻擊——但學校也總是體諒同學的心情之苦而婉言加以開導，從未予以消極的制裁。漸漸地培養了同學們有正義、有勇氣、敢說話、敢批評的民主風度。長白師生每一次播遷，都是以同學爲主幹，交涉、運輸、設營、採辦以及佈置校舍，建築簡易的宿舍，也都是同學份內的工作。神州陸沈，長白師生分批來台，其最後一批師生百餘人坐困榆林港的三亞，吃飯都成了問題。不得已師生合力

向各處告貸，師生輪流上山打柴。以前在廣州的時候，方先生的夫人也曾變賣金飾協助解救長白師生的困厄。是多麼感人肺腑的事蹟！

來台後對教育的貢獻

卅九年來台之初，長白五百師生的大家庭已拆散，他內心的苦痛，可想而知。於是息影台中，讀書種菜，意志有些消沈。第二年，蒙當時行政院長陳辭修先生聘為行政院設計委員會委員，參加教育文化組，從事教育方案研究工作，並赴各地考察政務。四十一年秋兼任台灣省行政專修班教育行政科主任。為時雖暫，却引導不少青年，走上報効國家的正途。四十三年八月蒙 先總統特任為考試院考試委員。四十九年又連任一次，前後計十二年，為國甄選人才，貢獻良多。且曾主持考試技術改進委員會多年，對於國家甄拔人才的方法，力求改進。直到五十五年第三屆考試委員任期屆滿，才專任國民大會代表。那時他已七十四高齡了，仍主持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教育文化組，三年之中，先後完成「改進大學教育之研究」、「改進師範教育之研究」及「改進圖書館之研究」三項專案，用力之勤，可以概見。

民國四十七年，杜元載先生初長台灣師範大學，堅約他任教務長，辭不獲已，允暫兼一年。任中銳意改進試務，嚴禁學生作弊；全校各系科課程，均編綱要，詳列教學目標，課程大綱，教學方法，參考書目等，彙編為「師範大學課程綱要」，師生共同遵守，非常方便。一年之中，他只辦公，不領薪，杜校長幾次把全年薪金送到家裏，都不肯收，最後只允每月領車馬費四百元；因他任考試委員，不肯領雙薪，這種清白的操守，真足以廉頑立懦。

民國五十年十月，他承國立編譯館之聘，任「反攻出版社」發行人，接辦「反攻」雜誌，歷十四年。鼓吹反攻復國，宣揚中華文化。民國五十四年多，被推選任中國測驗學會理事長。民國五十六年，卸任考試委員，時基隆崇右企管專校初創，聘他為校長。兩年後，他以年老為辭，卸却校長職務。五十八年九月，承教育部聘任為中國醫學院董事，後經董事會議推為常務董事，今仍在任。

他畢生致力教育，忘其年之邁，氣之衰。他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他對於教育，已超越「知」和「好」的藩籬，而達到「樂」此不疲的最高境界！

薰然仁慈的長者風範

他爲人溫文儒雅，忠厚純篤，從無疾言厲色。治事思慮周密，審慎開朗，所以經過多少驚濤駭浪，都能化險爲夷，轉危爲安。這種定靜工夫，非涵養有素的人，誰能辦到？而清廉儉樸，與師生共甘苦，尤爲難得。卅八年夏天，湖南局勢不穩，人心惶惶，人人都想盡方法，奔向廣州。那時他正在廣州爲長白五百師生遷穗食宿問題而憂心如焚，坐困廣州。方夫人攜帶兒女，很幸運的自湖南逃來，不料方先生看到她們却說：「你們來做什麼？我的學生還沒辦法解決！」這種場面，彷彿有違常情，但在他公而忘私的意識下，也就極其平凡了。老子說：「薰然仁慈，謂之君子」，他真可當之無愧。

如今，他當年所教導的學生，有的做了大法官，有的成了著名的工程師，有的講學海外，有的執教大學，都各有成就。尤其是他在戡亂時期所創辦的長白師範學院，現在有五百師生在台。參加反共復國的行列。教育部編第三次教育年鑑，對於長白師範學院曾有如下的記載。

「國立長白師範學院，設於我國東北之邊陲，共匪在東北倡亂，摧殘文化，迫害青年，該院首當其衝。惟全校師生堅貞不拔，始終追隨政府，卒來台灣。在專科以上院校中，該院遷徙流亡時間最久，奔走跋涉途程最遠，師生所感受之痛苦艱險最大，而所表現之反共抗俄意志最堅，忠貞愛國之精神最著。」這是真實的描述，客觀的評估，沒有一字一詞是溢美的。這是長白五百師生的大家長——方先生正確的領導所致。

今天，他親眼看到自己辛勤栽培的桃李，年年吐葩揚芬，結實纍纍，相信在他的內心深處，該感到非常欣慰吧！（七十二年八月台灣教育月刊三八〇期。艾弘毅訪問）

實事求是的王家驥先生



王家驥先生，字展雲，福建省仙遊縣人，民國前六年農曆八月十三日生。祖父是清代貢舉，父親也是秀才出身，三代耕讀傳家，儉樸成風，名重鄉里。

他幼時在村內私塾讀了四年，於民國八年進入莆田勵青小學肄業，其後歷經初高中而大學，至民國二十年畢業於大夏大學教育心理系。其後歷任小學校長、師範學校主任、縣督學、地方幹訓所教育長等職。民國三十五年應邀來台出任教育處督學，在職期間，提出許多關於視導工作的改進意見，甚得長官賞識。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出任高雄中學校長，首訂辦學準則，確立學校教育方針，繼而訂定各種章則，使得學校各項事務有準有則，皆能循序邁進。由於他開明的民主領導，公正的處事態度，實事求是的辦學精神，使得高雄中學成為南台灣最優良的學府。尤其他待人誠懇，敬重老師；秉持師道，清廉自守，注重教材教法，充實教學設備；反對特權，一切依照法令制度進行；力行節約，免除世俗的繁文縟節，使得高雄中學成為教育界最純淨的學府，最健全的園地。

民國六十一年九月，依法退休，揮別全心全力灌溉二十四年的高雄中學，各方頌辭，多如雪片；目前雖於教育行政暫卸仔肩，但對教育問題的關切更甚往昔，誠可謂，績著杏壇，功懋龔舍，澤惠桃李。